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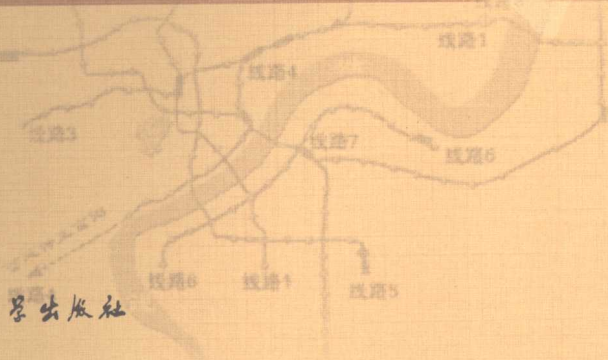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

浙江民国史研究通论

ZHEJIANG MINGUOSHI YANJIU TONGLUN

陶士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

图录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民国史研究通论 / 陶士和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2004-0493-8

I. 浙… II. 陶… III. 浙江史—研究—史式—Ⅲ D. K2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2310号

责任编辑 刘 芳

封面设计 李 兰

责任校对 吴 昊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民国史研究通论

ZHEJIANG MINGUOSHI YANJIU TONGLUN

陶士和 著

地址 北京城德胜门内大街甲128号 邮编 100120

电话 010-84029420 (编辑)

网址 http://www.zjpp.com.cn

2007

880 × 1280

10.75

字 数 522千字

定 价 28.00元

凡属著作权法保护之作品，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复制或传播。

浙江人民出版社 印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民国史研究通论/陶士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5004 - 6493 - 8

I. 浙… II. 陶… III. 地方史 - 研究 - 浙江省 - 民国 IV. K29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5210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官京蕾

责任编辑 张 兰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李 萍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0 月 第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 第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任：赵洪祝

副主任：夏宝龙 王国平 陈敏尔 巴音朝鲁

李 强 盛昌黎 张 曦

成 员：潘家玮 赵光君 马林云 沈立江

侯靖方 黄旭明 陈仲方 金兴盛

杨建新 俞剑明 陈永昊 万 斌

郑仓元 侯玉琪 徐 辉 胡祖光

许 江 王建满 王永昌 黄坤明

孙文友 徐止平 厉志海 张家盟

蔡 奇 楼阳生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

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

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

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前言

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学科，而从区域或地方的角度出发，对中华民国史进行研究，可以讲是属于一个更新的领域。在这方面，已开始有学者注意和涉及，并对有些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如对民国初年历史的研究，就先后有《武昌首义史》、《辛亥革命在湖北》、《辛亥革命在湖南》、《贵州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河南》、《辛亥革命在山西》、《辛亥革命在新疆》相继出现。^①又如对民国军阀史的研究，先后也有《西南军阀史》、《四川军阀史》、《新桂系史》等专著问世。^②而对浙江民国史的研究，也已有几位学者作出了专门的研究和探讨。最早是由郑云山教授等撰写的《浙江近代史》，其中“第七章辛亥革命中浙江光复”和“第八章浙江人民反对军阀的统治和新文化运动在浙江的开展”即为民初浙江史的专题研究。^③以后，由楼子芳教授主编的《浙江抗日战争史》和汪林茂教授撰写的《辛亥革命在浙江》都从某个历史发展的阶段，对民国史作了研究。而最近出版的由金普森教

① 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② 曾业英：《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③ 徐和雍、郑云山、赵世培：《浙江近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275页。

2 浙江民国史研究通论

授和袁成毅教授撰写的《浙江通史·民国卷》则从更全面的视角，对民国史作了研究，这可以讲是民国浙江史研究的开山之作。^①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开拓了民国浙江史研究的学术领域，同时也丰富了整个中华民国史的研究。

而笔者在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中，比较偏重于浙江晚清民初历史和浙江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而这些研究领域都是和民国浙江史的研究有关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大陆学术界，他们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因此笔者也试图尝试从较新的角度，对民国史作一通论性的研究。而从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有两种：

第一，用区域现代化变迁的理论来研究民国浙江历史的演进。

笔者注意到，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一批历史学者制定了一个集体研究计划，定名为“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他们使用当时流行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观念作为研究框架，把全国分为17个区域，分两阶段进行研究，第一阶段研究沿海沿江10个地区，（指广东、闽浙台、上海、江苏、山东、直隶、东三省、湖北、湖南、四川），第二阶段研究内陆7个地区。他们的研究成果较全面地阐述和分析了这些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的早期现代化变迁。如张朋园著的《湖南（1860—1916）现代化的早期进展》^②，李国祁

① 金普森、袁成毅：《浙江通史·民国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张朋园：《湖南（1860—1916）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页。

著的《民元——15年间闽浙地区政局动荡与领导阶层的急剧变动》^①都很有代表性，而且对笔者也很有启示。本书就基本上是围绕着民国时期浙江近代化的变迁为线索，对浙江的政治、经济及城市乡村的社会变迁等作了些专题研究。

在政治方面，本书专列了两个专题，即“第一章民初浙江民主共和国政权的建立”和“第二章民国前期浙江地方政治的转型”，对民国浙江政局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着重论述了在中华民国历史上浙江的地位和特点。

在民国初年，浙江不仅建立了革命的军政府，而且十分注意能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原则来建设新政权，从而在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浙江军政府在政治建设上主要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建立了省议会，二是颁布了《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该《约法》规定人民拥有充分的法权和政治参与权，地方政府首长由人民公举并要受到议会的监督和控制，议会对地方政府的各级首长的任命有同意权等。所以从民初中国政治民主建设的角度来看，浙江是很有特色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浙江于辛亥革命至民元年初，短短数月间，在民主政治之推行上，就其临时省约法之内涵而言，确有极为崇高之理想与惊人之进步，使其在各省中居于前导的地位。”^②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全国联省自治运动中，浙江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讲它是北洋系当权的省域中唯一兴起大规模省宪自治运动的省份。尤其是1921年9月7日，浙江省宪法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及

① 李国祁：《民国史论集》，（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57页。

② 李国祁：《辛亥革命后第二次革命期间闽浙两省之议会政治》，载《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19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649页。

《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施行法》，并于9月9日正式公布（故称“九九宪法”）。这是民国时期第一部正式省宪，它比自治运动的发源地湖南省宪法的正式公布早了近三个月。

在经济方面，本书的“第三章民国时期浙江实业家民间资本发展观的形成与实践”，“第四章民国时期浙江近代实业的创建与发展”就是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同时本书其他各章中也有不少内容是涉及经济的。的确在近代中国，曾经形成过一个浙江实业家的群体，这既是民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突出的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

近代浙江实业家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基本特点，这就是创办或参与投资的企业类型较多，行业并非单一；拥有的资本量大，财力比较雄厚，占据着经济上的很大优势；企业涉及的地区从浙江延伸到全国各地。正如有论者评述的那样：“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营业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故能与票号抗衡，在南中别树一帜。其营业区域，在长江南北，且有利用交通之便，浸而蔓延各地。其大本营在上海、汉口二处，而南京、镇江、芜湖、九江等处，亦在势力范围。”^①尤其要指出的是浙江实业家能对自己从事的实业活动加以总结，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近代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形成了一种开拓、进取、创新和竞争的企业家精神，形成了一种民间资本的发展观。笔者认为这些既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同时，这些经济思想、理念和精神也能给后人以很大的启示。

在社会方面，本书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民国时期浙江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初步的考察，这在民国史的研究上可以

^①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务馆1936年版，第22页。

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探索。这种探索包括民国前期浙江主要都市杭州和宁波的城市建设问题，也包括同时期浙江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租佃制演变的情况，尤其要指出的是本书对过去较少涉及的灾荒、荒政、浙人向东北移民、市镇“淫祀”等问题均有专题论述，笔者也力图尝试开拓一些民国史研究的新领域。

第二，在专题研究中，注重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以深化对问题的论述。

笔者注意到，不少学术界的前辈和同仁，在研究历史中都比较注重地方和区域问题的微观研究，都比较多地采用专题和个案研究（case study）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一改我们大学传统的通史教材体例，是一部以专题研究为主的研究性、学术性的新通史。正如费正清教授自己所言：“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学者主导编辑总其成。”^①

例如在分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变化时，编者就用了“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和“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60—1895年”三个专题加以论述；而在分析晚清政局的大变动时，就采用了“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辛亥革命运动”和“社会变化的潮流”四个专题加以论述，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①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而我们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史学研究的。如马敏和朱英先生撰写的专著《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就很典型。为此，他们的老师章开沅先生曾给予很高评价：“重视通过个案研究寻求理论解释，常能为我们提供若干新的视野、思想和参照系统。”^①因此这种研究方法，无疑给了我们研究民国浙江史以新的理念，同时也给笔者以很大的启迪。

例：本书在《浙籍人士与浙江光复》和《民国时期浙江实业家民间资本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中，均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对民初浙江历史的研究，本书就对三个人物进行了个案研究，从中来了解民初浙江政局的变化及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权的奋斗史。

第一个人物为秋瑾。因为在浙江辛亥革命史上，最大的武装起义就是皖浙起义，而秋瑾是皖浙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且秋瑾作为一个革命家很有自己的特点。她不仅具有杰出的宣传才能，也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为了争取会党和新军加入革命队伍，秋瑾是“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稍懈”^②。还有，秋瑾作为一个女革命家，性格刚烈，革命意志十分坚决，正如徐锡麟所称颂“有英雄之气魄，神圣之道德”^③，故孙中山也称秋瑾为“巾帼英雄”，周恩来曾为其表妹王去病题词，希望“发扬吾鉴湖女侠之精神”。

第二个人物为章太炎。我们知道章太炎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近代民主革命宣传家和活动家，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很重要的

① 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③ 郑云山、陈德和：《秋瑾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页。

地位。武昌起义后，章太炎和孙中山在事关民初政局变动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因此有论者认为民初的章太炎“已完全转向反动势力一边”，成了“一个自愿充当革命营垒内外各种反动分子的代表”。因此对民初政局大变动中的章太炎作专题的分析，不论对研究民初章太炎的政治态度，还是对考察这段时期革命派群体的政治倾向，都是不无意义的。本书作者认为武昌起义后，在“建立共和政权、进行实业建设、反对独裁复辟、维护‘临时约法’”等有关民初政局变动的大问题上，章太炎和孙中山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是章太炎在民初政局变动中的主导面。至于对章太炎当时拥护袁世凯当总统，提出应定都北京等问题，要作具体分析而不能认为是“专门和孙中山作对”是“献媚袁世凯”^①。

第三个人物是汤寿潜。汤寿潜是辛亥光复后浙江军政府的第一任都督，但由于汤寿潜是浙江立宪派的代表，因此有论者把浙江军政府称之为“被立宪派控制的政权”，评价也偏低。因此对汤寿潜的评价，不仅涉及他本人，同时也涉及对浙江军政府性质的认识。而本书作者认为随着汤寿潜积极参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活动，已导致他本人已逐步资本主义化；在辛亥革命时期，汤寿潜也主张建立共和民国，反对清朝专制统治；尤其是他任浙督期间，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对汤寿潜应有一个公允的评价。

对民国时期浙江实业家的经济活动，本书就分别以汤寿潜、刘鸿生、虞洽卿、张静江四人为例来加以阐述。

总之，本书是作者试图以专题研究作为方法，来对民国浙

^① 见《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96页。

江史作一区域研究，从而拓展和深化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但也正因为是专题研究，再加上笔者研究的领域有限，因此这种研究是很不全面的。以前已有学者论及：“作为一个从特定角度研究观察的结果，这种研究的成果也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制的，因为这种研究的角度绝不是惟一的，更不是排他性的。”^①因此还有很多专题有待深入研究。最后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本书作者才疏学浅，故对本书的探索和论述中所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疏漏之处，则尚祈各位专家学者和学术界同仁予以批评指教，是所至盼。

^①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页。